論宮前事件 ——十六世紀日歐文化衝突的頂峰

陳競翹*

摘要 宮前事件是1561年爆發於在平戶城內經商的葡萄牙商人和日本人之間的一次衝突事件。事件起源於平戶領主松浦隆信為獲取與葡萄牙商人貿易的特權，而促使領內民眾改宗信奉天主教，引發了佛教與天主教、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突。國內學界對該事件較為陌生，因此希望借此拋磚引玉，引起國內日本史學者對宮前事件及日歐文化衝突的討論。

關鍵詞 宮前事件；松浦隆信；洛倫索·了齋；日葡貿易；日歐文化衝突

前言及學術回顧

1561年，平戶發生了一起葡萄牙商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一場暴力事件。這場史稱“宮前事件”的發生地點，位於平戶港旁邊七郎宮的露店，因此研究松浦黨的學者以“宮前事件”命名。要了解宮前事件的前因後果，需要對松浦隆信¹、洛倫索·了齋等人、葡萄牙人的宗教貿易合一政策以及當時平戶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一番考察。

由於事件的特殊性及關注度不足的原因，中國國內幾乎沒有學者對宮前事件以及松浦隆信等人的事蹟進行過研究，可以說這是國內研究的空白區。本文實際上是筆者從自身畢業論文²中截止其中一章節，在此基礎上進行改寫和擴展而成。同時，近

年來國內對王直其人的研究日漸增多，而他恰好是日葡貿易的仲介，因此通過對宮前事件前的平戶和松浦、王直兩人關係的研究，來幫助學者們從側面深入分析王直的角色和作用。

日本方面則有一定數量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外山幹夫對松浦隆信的研究較多，其代表作有《肥前·松浦一族》³、《松浦氏與平戶貿易》⁴以及《松浦氏的領國支配》⁵等與松浦隆信相關專論。此外，對事件當中另一名主導人物洛倫索·了齋⁶的研究成果有結城了悟所撰寫的《洛倫索·了齋——平戶的琵琶法師》⁷。而日本國內翻譯的傳教士書信以及部分傳教士著作當中也有對事件的描述，將在文章中有所提及。但整體而言，日本國內也沒有對事件進行綜合性研究分析，只有簡單論述散見於各類文獻當中，如幸田成友的《日歐交通史》⁸，岡本良知的《十六世紀日葡貿易研究》⁹，松田毅一的《南蠻遍路：弗洛伊斯研究回顧錄》¹⁰、《南蠻史

* 陳競翹，暨南大學文學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專業方向為亞洲史。

料的發現：回顧信長時代》¹¹，高瀨弘一郎的《關於切支丹時代的“教商”》¹²，岡美穗子的《商人與傳教士——南蠻貿易的世界》¹³及《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¹⁴，日葡協會編撰的《日葡交通》¹⁵、《日葡交通的起源》¹⁶和《日葡通交論叢》¹⁷。本文將採用上下對譯的方式，以楷體標明書信日譯本放在括弧內，與筆者譯文對照呈現在文章中。

一、宮前事件爆發前的平戶

1550年，平戶的大名松浦隆信為了吸引葡萄牙商船來平戶港口貿易，同時也看中了與葡萄牙人貿易所產生的巨額利潤，由於松浦隆信不滿幕府的政策，希望借助與葡萄牙商人通商來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基於宗教貿易合一政策，他允許傳教士在平戶可以自由地傳教以換取日葡貿易在領內的順利進行。

葡萄牙人抵達平戶後，隨即與當地商人展開貿易。因此，在1550年，平戶打開港口迎接葡萄牙商船的到來，成為日本“南蠻貿易”史上首個與葡萄牙人通商的口岸。1555年，兩艘分別屬於杜亞爾特·達·伽馬（Duarte Da Gama）和迪奧戈·瓦斯·德·阿拉貢（Diogo Vaz De Aragão）的葡船抵達平戶。¹⁸在鹿兒島傳教無望的沙勿略等人，也選平戶作為傳教的落腳點。同年他到訪該地，拉開了基督教在平戶傳播的序幕。

在平戶傳教的加戈（Bathasal Gago）神父，向葡王約翰三世呈奉的書信上記載著1555年平戶基督徒發展的情況：

如今臣所在之地，處於平戶對岸的小島上，這裡約有五百名基督教徒。杜亞爾特·達·伽馬的商船靠岸之時，總有人來傾聽同船的葡萄牙人懺悔。而且因為要規勸新來的人入教，即使本地只有一個從豐後來的神父（伊留曼），但是每天都有入教的人。

（今臣が居る所の平戸は同海岸の小島

にして、此地に約五百のキリシタンあり。ドアルテ・ダ・ガマの船當港に來りしを以て、乗組のポルトガル人の懺悔を聴き、又新たに帰依したる者に信仰の事を説かん為め、イルマン一人と共に豊後より當地に來りしが、毎日帰依する者あり。）¹⁹

從加戈的書信描寫得知，沙勿略等人在當地的傳教進度能如此順利，首先歸功於葡萄牙人所帶來的商業利益。無可否認，平戶從領主到民眾對天主教的虔誠度遠不及貿易利潤所擁有的誘惑性強。在平戶，僅生月島和度島就有超過1,400人改信基督教。洛倫索·了齋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了沙勿略的受洗。其後，了齋更是陪同加斯帕爾·德·韋雷拉（Gasper de Vileira）進京謁見末代幕府將軍足利義輝，獲得傳教的許可。實際上，平戶領內依然存在一定數量對基督教抱以質疑心態的人。

與葡萄牙人的樂觀心態相比，令人尷尬的是相當一部分的日本大名對葡萄牙商船和傳教士的抵達大多抱以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他們十分歡迎隨船而來的貨物，但對隨船而來的傳教士則是避之則吉。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對西方教義的抵觸心理。他們畏懼西方教義對本土宗教文化將會造成的嚴重後果。

這種情況在葡萄牙商船抵達鹿兒島的島津貴久領地時已初現端倪。隨著日本國內反對傳教士在日本傳播基督教教義的情況愈演愈烈，最終在平戶演化為該時期兩種文化間表現出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宮前事件。

倘若沒有發生宮前事件，這個擁有日本貿易史上“兩個第一”的平戶港不會就此沒落。全盛時期的平戶，葡萄牙商團和教團紛紛在此駐紮，與松浦隆信及其轄內的商人甚至從日本各地而來的商人貿易往來，雙方各取所需。日本需要葡萄牙商人帶來的中國生絲以及葡萄牙的火槍，而葡萄牙則對日本出產的白銀需求量極大。但歷史沒有假設，當這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接觸時間越長，產生的摩擦糾紛就越多。

中外史事

二、洛倫索·了齋的推波助瀾

在 1553-1561 年間，葡船曾多次來平戶貿易，松浦隆信也趁機率先購入了大量歐式火銃和葡式大炮。即便如此，篤信佛教的隆信，對耶穌會的傳教士們禮遇程度雖高，但對基督教教義本身並沒有太大興趣。他旨在利用日葡貿易所帶來商品和利潤鞏固本藩實力。

同時，基督教在平戶的迅速傳播，與當地的佛教以及本土宗教信仰產生碰撞，雙方基於教義和理念大相徑庭，不少信徒間就此爆發嚴重衝突。之所以會產生各種誤解，離不開兩種文化的差異性。兩者主要在以下問題上產生分歧：

一、日本佛教受中國佛教的影響，注重對佛像的崇拜，而基督教則是禁止對偶像產生任何形式的崇拜。

二、日本人敬奉多種神靈，基督教教義則規定只有一個上帝，多神崇拜與一神教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三、日本社會階層固化，不平等現象十分常見，基督教提倡人人平等。

二者在這些理念上無法達成共識，以致引發誤會。部分新改宗的基督教徒因遵守基督教義（不允許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而破壞了佛教寺廟和墓地。加戈神父也言及到韋雷拉為了加快基督教在平戶的推廣，與領主去勸百姓入教，甚至不惜將佛像、日本宗教書籍等物品搜集起來，集中送到海邊燒毀。²⁰ 韋雷拉的行為實際上已觸犯了平戶的眾怒。

不僅如此，他們還和拒絕改宗的佛教徒進行論戰，其後雙方為此進行過數次宗教爭論。弗洛伊斯在其《日本史》中也提及到，有僧侶在講法當中作出針對基督教以及上帝的言論，並要求民眾不能加入“如此惡毒的宗教”。²¹

了齋則通過向僧侶發出天主教教義問題，以回應來自佛教教義的挑戰。弗洛伊斯指出，這些僧侶時常對問題回答不上來，卻又不願意否認自己對基督教的中傷。²² 可見，日歐文化正以一種不可預知

的態勢發展下去。

在成為耶穌會傳教士後，了齋一直致力於為傳教事業服務。他努力學習教義，掌握教理。此外，作為琵琶法師，了齋還通過即興演奏的方式，將聖歌的旋律傳唱於民眾。²³ 與了齋結識的耶穌會會士阿爾卡索巴（Al Cazzova）在其信中寫到：

他們一群人當中有個日本人（即了齋），他僅僅用眼睛看一看，就能馬上默記教義，簡直是幫了司祭的大忙了。也就是說，司祭在發表長篇大論的時候，直接派他上場即可。由於他在對教義問題上總能有深層次的考慮，所以總有人以為司祭可能是日本人。

（彼らには一日本人（ロレンソ）が同伴しており、ごく僅かしか目は見えないが、デウスの教えを甚だよく暗記し、司祭にとって非常な助けとなっている。すなわち、司祭が大いに議論する時には、直ちに彼を用いるのであり、彼はデウスのことどもを語る上で深い思慮と言葉を有するが故に、司祭が日本人と論議することを可能ならしめているのである。）²⁴

1559 年，了齋代替韋雷拉，應松永秀久的邀請，前往其領地，與西禪寺主持再次進行宗教爭論。經過數日論戰，了齋接連擊敗了天皇的教師清原外記和結成山城守。了齋的勝利讓更多人對基督教感到折服，高山家族更是多人受洗。

了齋的作用無需置疑，在他的推波助瀾下，日歐文化之間的交鋒更為激烈。無論是佛教徒，還是基督教徒，他們都不願意失去平戶的精神領域。雙方通過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途徑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可見當時平戶民眾的精神世界必定不會感到空虛。

由於此時已有佛教徒暴動的跡象，領主松浦隆信便放逐了平戶傳教的耶穌會負責人韋雷拉，但並未明確禁止傳教。為此，佛教徒的怒氣也未加以消解。松浦的模稜兩可，把雙方都有得罪，為其後宮前事件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三、宮前事件爆發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1561年，隨著葡萄牙商船的到來，平戶及其周邊博多、堺市、豐後等地的商人紛紛與葡萄牙人開展商貿活動。當時由費爾南·德·蘇薩（Fernão De Sousa）領航，有數十名葡萄牙水手的葡萄牙商船來日貿易。

但由於在生絲交易上產生了摩擦（另有說法是語言不通），雙方關係迅速惡化。日本商人藉口葡萄牙商人任意拋甩日本貨品在先為由，武力擊打部分葡萄牙商人，葡萄牙人也拔出刀具，砍向日本商人，雙方引發了大騷亂。

該事件被當時的一位傳教士在其書信中詳細記載：

感恩吾主，再度抵達平戶之際，此地掀起了一場風波之事。在平戶港內，一名葡萄牙人沒有與一名異教徒日本人交易，這名日本人用一把生絲擊傷了葡萄牙人的頭部。於是葡萄牙人對其群起而攻之，還刮傷了他的臉。異教徒們拿起武器，更揚言要殺光葡萄牙人。這個時候，基督教徒們紛紛跑出來保護這些葡萄牙人，並對那些人說，如果要殺葡萄牙人就先把他們殺死。

（再び平戸に赴きし時大に主に感謝すべき事件起こりたり、平戸の港に於いて一人のポルトガル人異教徒なる一の日本人と商売をなしが日本人は一把の生糸を以てポルトガル人の頭を打ちしかば、ポルトガル人は彼を追撃し其顔に傷けたり、茲に於いて多数の異教徒武器を携へて来集し、ポルトガル人を悉く殺すべしと激語せり、此の時キリシタン教徒等出来り、集まりたる人々に対ひポルトガル人を殺す前に先づ彼等を悉く殺さるべからずという。）²⁵

這份記錄將事件的起因和過程詳細地呈現給後世，是其可取之處。但因其立場和傾向性，其客觀性不得而知。在遲遲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日本方面邀請了高級武士前來仲裁，更讓葡萄牙

人誤以為高級武士是日本商人請來對付自己的幫手。其後，葡萄牙商船全副武裝，高度戒備，順勢對日本商人和武士團發起攻擊。武士團發起反擊，致使葡萄牙方面包括船長在內死傷 14 人並連夜逃出平戶。

平戶領地內上下對事件表現出高度關注。表面上這是一場商貿的糾紛，但其實是平戶的基督教徒與佛教徒之間的爭端。日本學者幸田成友認為，正是因為松浦隆信在對待基督教問題上表現出表裡不一致的態度，是導致了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之間衝突的主要根源：

關於在基督教的問題上，松浦隆信的言行根本就是自相矛盾。他一邊說著好話來迎合努涅斯神父，沒過幾年又把加斯帕爾·韋雷拉神父趕出領地。……他轄內的生月島和度島的教徒數量發展過快，雖然佛教徒們對此表示出強烈的反抗是鼓動隆信得出的結果，但是在耶穌會看來，隆信的行為自然就說不過去了。

（イエズス教問題に関し、松浦隆信には表裏矛盾の言行があった。彼は裏に甘言美辞を以てヌネスを迎えながら、数年たたぬ中に教師ガスバル・ビレラに領内退去を求めた。……この所領生月、度島に多数の信徒を獲得したことに對し、佛教僧侶の激烈な反抗運動が隆信を動かした結果でせうが、イエズス会側から言えば、隆信の挙動に釋然たり得ぬはもちろんです。）²⁶

從更深一層分析，一個事件的爆發歸結於其偶然性，更應該認識到其發生的必然性。宮前事件看似因為外部原因而導致，但經過多重因素累積，導致其最終產生。實際上，事件爆發的真正原因並非松浦的宗教態度，而是日歐兩種文化間長年累月的交鋒與衝突，更是因為兩種文化在利益問題上的博弈所引起的。

事件發生後，在豐後國的日本教區長戈美士·德·托雷斯（Gomes de Torres）神父對日本方面沒有處罰日本人的做法深感失望，逐漸失去對松

中外史事

浦隆信的信任感和耐心，因此他決定終止葡萄牙與日本在平戶的貿易活動。隆信表裡不一的態度實際上與其所追逐貿易利潤的目標有關。正如前文所言，包括隆信在內的多數日本大名並不是真心歡迎耶穌會在其領地內傳教，作為一個佛教徒，隆信需要迎合其他佛教眾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如此對待耶穌會士的態度並非不能理解。

但衝突導致平戶港很快失去了與葡萄牙貿易的地位。葡萄牙人開始尋找下一個適宜貿易居住的港口，並最終來到了長崎。同年，路易士·阿爾梅達（Luis de Almeida）神父接到托雷斯的命令，要尋找一個新的港口，而印葡果阿總督也建議先避開平戶。隨後阿爾梅達神父成功接觸大村純忠並與其進行談判。

他向大村提出三個在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看來相當合理的條件：

一、答應將港口周邊的二里格地讓傳教士與當地農民共同使用，以保留教堂用地。

二、沒有神父的允許教堂範圍內不能有任何的異教徒居住。

三、免除來日貿易的葡萄牙商人十年的稅款。

大村表現出極其友好的態度，對葡萄牙商人及耶穌會所提條件一應允諾。1562年，大村受洗為基督教徒，領地內的橫瀨浦港成為新的日葡貿易港口。在弗洛伊斯的陪同下，葡船船長佩爾達·蓋拉（Dom Perda Guerra）帶領船隊前往橫瀨浦。不過1563年橫瀨浦遭到大村純忠的反對派燒毀，因此在1564年，葡萄牙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再度入泊平戶。但即使松浦隆信多番表示邀請葡萄牙商船再次進入港口貿易，並試圖重建教會，耶穌會士一眾人等仍然對其抱有不信任態度。

阿爾梅達在信中充滿了他的不安：

根據與神父們的和解，（領主）希望能夠如同往常那樣在這裡跟葡萄牙人進行貿易，但是他去年引起了葡萄牙人們對他的反感。他聽說一艘從中國來的帆船在他領地附近的港口靠岸（沒有顧及僧人們的反對），便允許了教堂的重新修建，不出幾日就有了

一艘舢板船和一艘帆船進入平戶港內。我們對此感到為難，一些教徒更是感到不安。

（パードレと和解し依りて、其地に於いて常にポルトガル人貿易することを得べしと期待せるが如し、彼は昨年ポルトガル人をして反感を起こさしめたることあり、支那より来りし一隻の帆船其港に接近せる他の港に着きたるを聞き（坊主らは常に反対せしに拘らず）教徒の集會すべき會堂を建つことを許可せり、然るに数日を出でずして平戶の港に一隻のジャンク船と一隻の帆船と入港せり、我等は之に依り聊か当惑し教徒は不安を感ぜしが。）²⁷

當時居住在度島的弗洛伊斯也認為兩者間的矛盾無法調和，他強烈反對葡萄牙商船再次到平戶港貿易，而松浦的家臣對基督教在轄區內要修建教堂及允許神父居住等條件也堅決不讓步。顯然，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在文化上的堅持，使雙方寧可割捨貿易利潤，也要避免在宗教文化上的再度衝突。

1565年在弗洛伊斯的斡旋下，葡萄牙商船最終還是去了大村純忠的福田港，然而松浦氏與葡萄牙人之間再度引發衝突。同年由船長若昂·佩雷拉（Dom João Pereira）帶領的船隊準備進入平戶港，科斯塔（Balthasal Da Costa）神父命令船隊立刻前往大村的福田港。松浦氏得知後大為震怒，馬上派出約80艘大小船隻攻擊福田港。

葡商船無視了平戶的警告，船員們即將登陸之際，雙方交戰一觸即發。葡船一度陷入苦戰，但經過三小時的戰鬥後最終獲得勝利，松浦氏一方死傷者多達二百人。葡船順利進入福田港後，自1565年至1570年間，幾乎每年都會在該地停泊（除1567年在口之津港靠岸外）。此後15年間，平戶港的對葡貿易活動逐步消退。

四、日歐文化間的乖離性

宮前事件是日歐文化交流史上首次大規模的衝突，其爆發標誌於日本傳統文化與歐洲基督教文化

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兩種文化之間滿佈乖離性。一方面，受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對於突如其來的基督教文化感到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感產生於日本社會的武士和宗教群體，基督教的到來動搖著他們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基督教文化遭到上層社會的排擠之際，卻在日本民間備受歡迎。日本傳統文化中注重“德”的作用，而歐洲基督教倫理文化強調正義，日歐道德觀的明顯差異也讓兩者的乖離率加大。

原本有著信奉神佛膜拜偶像（佛像、神像）傳統的日本人，突然要接觸拋棄偶像的宗教，無法對此作出適應性調整。相比起歐洲傳教士去修道院出家以進行“靈魂洗滌”，在日本出家修行被認為是逃避世事。而且佛教僧侶在日本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實際上與下層社會已經脫節。僧侶擁有寺廟領地，可以進行買賣和租佃，意味著日本僧侶也是封建階層的一部分。弗洛伊斯在《日歐文化比較》中也歷數日本僧侶的腐化、墮落、貪婪和虛榮，甚至為圖名利不惜參與戰爭。他還指出他們與

基督教修士有較為顯著差異，注定日本佛教文化排斥歐洲基督教文化。

但接受基督教的那部分日本人，於他們而言，基督教文化如同一扇通往新世界大門。葡萄牙商人帶來的新事物，讓他們認識到日本與世界的差距，也看清了日本傳統文化固有的弊端。這部分日本人通常社會地位低下，不受上層政府重視，希望通過外部力量為自己帶來本質的變化。

基督教文化與日本傳統文化各自代表不同文化層面和階級利益，衝突在所難免。正如弗洛伊斯在《日歐文化比較》的自序當中所說：“在這一文化發達的、創造力旺盛的、具備自然知識的人們中間，居然竟有如此極端的對照，簡直令人不能相信。”²⁸旨在維持傳統性的日本上層社會，自然是不希望看見基督教的廣布流傳。基督教所宣揚的“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信條廣受下層人們的推崇。同時，商業貿易帶來的利潤也讓下層的日本人感受到豐厚物質所帶來的暢快感。為此，日本基督徒認為有必要革除等級制度所造成的弊端，推動日本社會發展。■

註釋：

1. 歷史上有兩位同名同姓的松浦隆信，本文所指之人是肥前國大名，嵯峨源氏一流松浦氏第25代領主。
2. 陳競翹：《16世紀中晚期葡萄牙人在東亞貿易中活動的考察》，寧波大學，2016年。
3. [日]外山幹夫：《肥前·松浦一族》，新人物往來社，2008年。
4. [日]外山幹夫：《松浦氏と平戸貿易》，國書刊行會，1987年。
5. [日]外山幹夫：《松浦氏の領国支配》，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1997年，第55期。
6. 洛倫索·了齋：1526-1592，安土桃山時代的日籍耶穌會士。原為盲人琵琶樂師，受洗後在日本積極傳播天主教，取教名為ロレンソ了齋。後因豐臣秀吉頒佈伴天連追放令，被驅逐至九州，1592年病逝於長崎。
7. [日]結城了悟：《ロレンソ了齋—平戸の琵琶法師》，長崎文獻社，2005年。
8. [日]幸田成友：《日歐交通史》，岩波書店，1942年。
9. [日]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葡貿易の研究》，《社會經濟史學》，1934年，第4期第8卷，第827-855頁。
10. [日]松田毅一：《南蛮遍路：フロイス研究回顧録》，朝文社，1991年。
11. [日]松田毅一：《南蛮史料の発見：よみがえる信長時代》，中央公論社，1991年。
12. [日]高瀬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における"教商"について》，《古文書研究》，1983年，第6期第21卷，第10-32頁。
13. [日]岡美穂子：《商人と宣教師 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年。
14. [日]岡美穂子：《南蛮·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思文閣，2013年。
15. 日葡協會編：《日葡交通》，日葡協會，1929年。
16. 日葡協會編：《日葡交通の起源》，協和書房，1942年。

中外史事

17. 日葡協會編：《日葡通交論叢》，日葡協會，1943年。
18. [印度]蘇拉馬尼亞姆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3年，第111頁。
19. [日]村上直一郎訳註：《耶蘇會年報.第一冊（長崎叢書2）》，長崎市役所，1926年，第6期。
20. [日]松田毅一監訳：《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第三期・第1卷（1549-1561）》，同朋舎，1997年，第297頁；[葡]ルイス・フロイス著，[日]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完訳フロイス日本史》，《大友宗麟編I第16章（第I部18章）》，中公文庫，2000年，第160-162頁。
21. [葡]ルイス・フロイス著，[日]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完訳フロイス日本史》，《大友宗麟編I第16章（第I部18章）》，中公文庫，2000年，第166頁。
22. [葡]ルイス・フロイス著，[日]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完訳フロイス日本史》，《大友宗麟編I第16章（第I部18章）》中公文庫，2000年，第168頁。
23. [日]松田毅一監訳：《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第三期・第1卷（1549-1561）》，同朋舎，1997年，第214頁。
24. [日]松田毅一監訳：《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第三期・第1卷（1549-1561）》，同朋舎，1997年，第120頁。
25. [日]村上直一郎訳註：《耶蘇會年報.第一冊（長崎叢書2）》，長崎市役所，1926年，第16-17頁。
26. [日]幸田成友：《日歐交通史》，岩波書店，1942年。
27. [日]村上直一郎訳註：《耶蘇會年報.第一冊（長崎叢書2）》，長崎市役所，1926年，第35頁。
28. [葡]弗洛伊斯著，[日]岡田章雄日譯註，范勇，張思齊譯：《日歐文化比較》，岩波書店，1965年；商務印書館，1992年。